

【社会观察】

□晓言

金色大厅不“金贵”

金色大厅迎来了它密集的中国表演季。数十位歌唱演奏艺术家,上百个表演艺术团体,甚至是市县级的小乐团,小街区的合唱队,也掺和进来,把金色大厅的租赁季挤得满满当当。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更为国人熟知,这里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长年演出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是在这里举办。国人熟知这个地方,更因为近年来不少国内的歌唱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登台演出,似乎中国的歌唱水平、音乐演奏艺术已经跃升到世界顶端,在著名的音乐之都占有一席之地。

近日,笔者有兴游访了维也纳,当然也参观了心目中的这块艺术圣地。

这个俗称“金色大厅”的建筑,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区,前廊柱上方横刻一行德文,名叫“Wiener Musikverein”,直译是“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它既是建筑的名字,也是一个协会的名字。人们之所以称它“金色大厅”,是因为音乐厅内装修得金碧辉煌,美轮美奂,故而得名。

1863年,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一世,也就是茜茜公主的丈夫,划出地皮,建造了协会大楼。楼里有六个大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色大厅”,大厅容纳座位1800个。其他五个厅分别是:勃拉姆斯厅、木厅、玻璃厅、金属厅和石厅。大厅建成后的1869年,奥地利的音乐奇才莫扎特曾在此进行首场演出。此后,这里每年有将近300场演出,节目没有

一天是重复的。只是一战和二战期间,这里有过短暂的空置。

维也纳不愧是世界的音乐之都,街头巷尾,广场空地,三五混编的小乐队随处可见,笔者曾在维也纳步行街的街口看到一支业余演出的乐队,其阵容的庞大,各音部乐器配置的豪华,演奏的和谐,音质的纯美,绝对可以和我们省级的交响乐队媲美。金色大厅是维也纳音乐生活的支点,每年的新年音乐会都会在这里举行,通过电视转播,大厅金碧辉煌的装饰和无与伦比的音响效果年年展现在全世界观众面前。

但是笔者来到此地,询问起金色大厅的情况,当地人却淡然一笑,未置可否,倒是与金色大厅相隔不远的地方,还有两座建筑,让他们推崇备至,如数家珍,这就是比邻而立的维也纳歌剧院和奥地利国家音乐厅。原来,前者与后者在奥地利的地位是大相径庭的。奥地利政府为后者每年给予50万欧元的补贴,歌剧院和音乐厅都严格规定,不准上演不出名的作品或处女作,只能演那些早已被肯定的名作。每年大约演出300多场。全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无不以在国家歌剧院表演为毕生的荣幸。2011年12月,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

俊华受到邀请,在维也纳国家音乐厅登台演唱,她用歌声感动了现场观众。她也成为在这个欧洲顶级音乐厅放歌的唯一一位中国歌唱家。

“金色大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它需要自负盈亏。一方面,它和维也纳歌剧院跟欧洲大部分剧院一样,每年9月到次年6月的演出季由剧院官方排档,邀请乐团,艺术水准有保证,门票通过官方渠道出售。非演出季时,剧院员工放假,但他们“停业不关门”,租赁场地,或进行剧院维修。此时售票“由承租方承担”。正是在这一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成了我国的一些歌唱演员和音乐团体“镀金”的绝好舞台。

1998年2月,金色大厅迎来第一支中国民族乐团的演出,中国的虎年新春音乐会在这里举办,此后的十六年,金色大厅迎来了它密集的中国表演季。数十位歌唱演奏艺术家,上百个表演艺术团体,甚至是市县级的小乐团、小街区的合唱队,也掺和进来,把金色大厅的租赁季挤得满满当当。于是金色大厅的租赁费也飞速上涨,从上世纪末的每天八九万人民币上升到今年的每天五万欧元。当然,这些演员和团队的租赁费不用自己掏,有的是企业赞助,有的是政府的行政经

费。这些演出水平参差不齐,只能靠免费送票拉观众。这样一来,不仅败坏了当地一直靠买票欣赏音乐的传统,给当地的民众造成了审美困惑,也让中国的声乐、器乐大为蒙羞。

有关领导部门发现问题后,2010年曾对国人一窝蜂似的跑到金色大厅演出进行过限制,但是毫无作用。金色大厅的中国风已经越刮越盛,越刮越凶。直至2013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维也纳金色大厅咋成中国人“卡拉OK厅”》后,加之联系群众实践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这股风这才逐渐冷却下来。即便这样,直至文化部近日印发《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对国内各级各类艺术团体到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展演场所或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进行“镀金”性质展演活动予以坚决制止为止,上半年已有130多家文艺团体签订了合同,进行了演出或准备演出。

笔者离开金色大厅的时候,对面路口站着一位打扮成马戏丑角的乞丐。“你好!”他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向我们问候,他在这里专门等候着前来参观的中国游客,用行为艺术和合照留影讨要小钱。

(本文作者为作家、国家一级编剧)

我吃过各种各样的“自助餐”,但有两顿“自助餐”是极度难忘的。

那年从进入巴基斯坦开始,我就没有喝过当地的水,每天喝的都是瓶装矿泉水。这貌似有些“奢侈”,其实是因为印巴地区的水质都比较硬,我们的肠胃难以适应,喝了准会生病,那就只好“奢侈”一回。

在拉合尔的那些日子,偶尔还是能够赶上下雨的,这时天气潮湿,阴云翻转,气温稍降,让人在炎热的季节享受天降甘露,那是相当惬意的。在这里,每天吃得最多的就是各种鸡肉,还有烤馍,偶尔也会弄个汤,基本看不到蔬菜,吃来

【以文为戈】

奢侈的“自助餐”

□刘武

吃去,那个尝过各种美味的中国胃就会来折磨我们。记得在伊斯兰堡时,我和朋友偶尔也会去附近的两家中餐馆调口味,但那中国菜做得实在不敢恭维,也就凑合当中餐吃了。其中一家餐馆的厨师是个香港人,在巴基斯坦已经呆了十几年,每个月他的收入也不过合人民币6000元左右。

终于有一天,大家有点忍无可忍,决定自己出手,改善改善口味。我们找到餐馆的厨师,跟他们说那顿中饭免了“劳动”他们,我们自己来做,这种情形估计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也可能想看看中餐到底如何,便放手让我们推出一位“大厨”。

平时被大伙称赞为“好男人”的一位哥们儿就一马当先,撸袖子上阵。说起来,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手艺,到了人家那里也要大打折扣。一是食材,这巴基斯坦人的厨房里只有鸡蛋、西红柿、土豆老三样,你能做出什么?二是器材,人家的厨具没有炒锅、锅铲,只有平底锅、汤锅,你怎么操持?当然,还有一点是调料,人家也没有酱油、味精、醋之类,只有盐、孜然,你怎么调味?

可这也没有难倒我们的“好男人”,他进了厨房,一通忙活,当地的厨师就在一旁看热闹。那厨房里居然没有空调,可以想象有多么火热,做一顿饭下来,比洗桑拿出的汗还多,那是什么感受?

反正,就那样噙哩喀喳一弄,最后“好男人”给大伙儿端上来两菜一汤,一个是炒土豆丝,一个是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西红柿鸡蛋汤,这把大伙儿高兴得像吃了山珍海味似的,好一番疯抢,吃得津津有味。“好男人”也给巴基斯坦的大师傅们留了一口,他们一吃,也是连声叫好,估计这辈子也没想到土豆、西红柿、鸡蛋还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口味。他们甚至开玩笑问“好男人”是否想在那里找份工作,要同意的话,就把他留下来。

每次“好男人”一出厨房,满脸都是汗珠子,背上也都湿透了,估计汗量可以用“升”计量了。第二天晚上,他继续下厨,做了洋葱炒鸡蛋、土豆炖牛肉,还有鸡蛋炸酱面。这炸酱是怎么弄出来的,我还真想不到,估计是把巴基斯坦人吃的哪种面酱搁油锅里炸了一下,弄出了新鲜玩意儿。

这样的“饕餮狂欢自助餐”也就弄了两次,过过瘾就行了,再想想玩,一是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怎么折腾也是“老三样”;二是受不起那罪,四十几摄氏度高温的天气,再在火炉边生烤十几分钟,那是什么滋味啊?

现在回想起来,那两顿“自助餐”多么“奢侈”!

(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作家)

【名家背影】

□戴永夏

严文井先生二三事

素有“童话爷爷”之称的已故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其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童话”。

素有“童话爷爷”之称的已故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其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童话”。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两次拜访这位当代著名作家。虽然时间短暂,但所见所闻,至今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得第一次拜访严文井先生,是在1980年3月3日。那年他已66岁,身体中过风,我去时他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但他精神很好,待人很亲切。他一听说我是从山东来的,仿佛见到“老乡”似的,热情地问起山东的情况,并对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泰山等风景名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深情地说:“我小时候读《老残游记》,就很向往这些名胜,盼着能有机会亲眼去看看。可是,‘四清’运动中我几次经过济南、泰安,跟这些名胜擦肩而过,却一直未能下车了此夙愿……”接着,他便给我讲起这段沉重的往事……

那是1964年深秋,山东的“四清”运动在曲阜、齐河、海阳三个县重点展开。当时,严文井带领中央文化部门的一批干部被派到曲阜搞“四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指导下,当时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干部都打成“四不清干部”,进行残酷批斗。而严文井却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顶住这股“极左风”,把所在大队的好干部都保护了下来。长期以来,他还跟这些农民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曲阜,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苦。身为团长的严文井也跟其他队员一样,住到贫下中农家中,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严文井所住的那家,老少三代五六口人,吃的是地瓜面煎饼菜糊糊,几乎连咸菜都吃不上。每当吃饭时,房东便端上几个腌红辣椒,专供这家的老爷爷和严文井下饭,别人一律不准吃……“看着孩子们眼巴巴地盯着红辣椒的目光,我又怎能吃得下去?”说到这里,严文井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们



1996年6月9日,严文井看望冰心。

已解放十多年了,农村还这样穷,农民生活还这样苦,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沉重。所以,尽管几次从曲阜回北京都经过济南、泰安,但想想还有那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我又哪有心思去逛名胜、登泰山?”

那时,严文井住在东总布胡同一个普通的大杂院里。他住的4间平房,墙壁已发黑,房门已残破。两头两间,分作卧室、书房;中间两间通房,杂放着蜂窝煤炉、老式桌椅和两张靠墙的沙发。多少年来,它一直担负着客厅、厨房兼餐室的各项职能:在这里吃饭,在这里会客,甚至在这里接待外宾。至于老作家的书房,不过是一间仅七八平方米的斗室,室内的空间几乎全被书籍占满:靠窗的写字台上书稿盈案,报刊堆积;书架上摆着书,柜子里放着书,连不大的地面上也堆满了书刊,散乱而拥挤。老作家就是在这里看书、写作。日夜辛勤笔耕……

其实,有些朋友早就注意到严文井的住房问题了,有的也帮他活动,劝他搬家。老作家周立波去世前,在医院里拉着文井的手说:“文井啊,我真没想到你至今还住在‘棚户区’。我病好出院后,一定想法帮你解决房子问题……”严文井感激地点点头,但并没把此事放在心

上。因为他知道,许多群众的住房比他还紧张。而周立波不久就与世长辞了,这点小小的许诺,也未及变成现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宿舍楼落成了,身为该社社长的严文井,理应住进新楼了吧?但是,眼看着别的同志都搬进了新房,他一家仍住着墙皮斑驳、阴暗潮湿、拥挤而又夏热冬寒(卧室冬天放不开炉子)的“陋室”,老伴康志强颇有意见,严文井却劝说老伴要想开:“本来客观上就苦,而我们不想它,不去追求达不到的东西,你就不感到苦。主观去追求,而达不到,就又增添了新的苦,这时就要得病了。住得破点、旧点,与群众的距离也许还近些。就目前说,我们比那三代同堂的,还算在天上呢!我们的处境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接着他又说:“你年纪都不轻了,最要紧的还是抓紧时间写点东西,使我们的晚年过得精神充实而有意义。我们应该拿出的多,索取的少,这才不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严文井自幼就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读幻想性、故事性比较强的小说。9岁那年,他就“蒙”完了《西游记》、《镜花缘》等书,以后又继续“蒙”《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儒

林外史》和《老残游记》等。上初中一二年级时,他就读完了家里所有的藏书,胃口越来越大。以后又读起《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以及鲁迅、郭沫若、蒋光慈、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为了读书,他曾如痴如醉地钻进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为了一本未曾读完的书,他甚至留下终生的遗憾……

我第二次去拜访严文井是在1983年4月3日,他重点跟我谈了读书问题。当时他虽已年近古稀,但读书的兴致仍不减当年,只是读书的内容更深广,涉猎的门类更多,更善于多读深思。他不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甚至还读数、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学书籍。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现在,只要我读得懂的,无所不读,甚至读不懂而又必须读的,我也要勉力去读懂它。”

针对有些爱好文学的青年读书太少、写出的东西知识含量低等问题,严文井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有一部分有出息的青年作者,一般都是读书比较多的。但是也有一些投稿者,读书很少。他们以为只要读上几本流行小说,就可以照葫芦画瓢写出作品。岂不知搞文学创作的人,不但文学书要读,文学以外的书也要读。你从事文学创作,写书给人看,教育人,世界上哪样知识不需要知道?”他停了停,转而又说:“当然,读书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要持之以恒。有的书读了能‘立竿见影’,有的就不能,但绝不是无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凡有点成绩的,多数都是从爱好读书开始的。不爱读书而能在创作上搞出成绩来的人是没有的……”

严文井关于读书的教导,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经验之谈。在今天读来,仍觉语重心长,给人以很深的教益。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出版社编审)